

陕北丹霞地貌军事文化研究

——以府谷莲花辿为例*

张 博

提 要: 2017年, 陕北地区发现特大型丹霞地貌地质遗迹景观带。其不仅在地质学上有重要地位, 在历史文化方面也有较大意义。由于陕北地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 特别是长期为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军事对峙前沿的独特背景, 使这一地区的丹霞文化与南方地区大有不同。以府谷莲花辿地区为代表的陕北丹霞地貌具有“顶平”“身陡”“麓缓”三大特点, 为宋、明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布防与作战提供有利条件, 进而形成极具军事色彩的陕北丹霞文化。

关键词: 丹霞 莲花辿 府谷 陕北

2016年, 陕西省新发现省级以上地质遗迹18处, 其中府谷莲花辿、靖边龙洲等6处陕北丹霞遗迹引人注目。2017年8月, 相关专家学者对陕北丹霞遗迹景观进行了考察与研讨, 充分肯定了其在地质上的重要意义。^① 由于陕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 特别是长期作为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对峙前沿的独特背景, 使得当地人们对于丹霞地貌的开发利用独具特色。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陕北丹霞文化也与传统侧重于古寨、墓穴等方面的南方丹霞文化有所不同, 陕北丹霞文化突出体现在军事文化方面, 其中地处三省交界地区的府谷莲花辿丹霞地区极具代表性。

一 丹霞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丹霞地貌是红层地貌的一种特殊类型, 虽然关于其具体定义国内学界尚有争论^②, 但其因特殊的地貌形态和较高的美学价值而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自1939年陈国达首次提出丹霞地貌这一概念以来, 国内外相关学者对其形成构造及相关价值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增强, 丹霞地貌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并逐渐走向世界, 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③ 与此同时, 人文科学领域也开始逐渐

* 本文为陕西省地质调查院“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调查”(项目编号: 20170201)子项目“陕北丹霞地貌与人文地理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 2017年10月14—16日, 在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研讨会上, 经彭华等8位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缜密论证, 专家组认为“陕北丹霞的发现, 突破了已往对中国丹霞分区、中国丹霞构成、丹霞地貌类型、丹霞地貌演化以及地学效应的认识。其独特性、科学性、观赏性成就了陕北丹霞是中国丹霞乃至世界丹霞科学的自然博物馆, 同时也是丹霞地貌与黄土地貌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在2017年10月26—29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全国红层与丹霞地貌学术讨论会上, 以彭华为代表的与会学者认为: “陕西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丹霞地貌的省域调查, 对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意义重大。陕北丹霞地貌分布广泛, 形态多样, 地理位置特殊, 以‘沟谷’型丹霞地貌为特色, 尤以波浪谷、羚羊谷、天生桥等观赏价值极高, 是中国丹霞地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类型, 特征鲜明, 规模巨大, 中国独有。”参见陕西省地质调查中心: 《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资料由陕西省地质调查院提供。

② 参见崔海亭、黄润华: 《丹霞地貌名称的滥觞与泛化》, 《中国科技术语》2017年第2期。

③ 参见彭华、潘志新、闫罗彬、Scoot SIMONSON: 《国内外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述评》, 《地理学报》2013年第9期。

关注丹霞地貌,并且开始挖掘其在地质之外的历史文化意义。黄进与黄瑞虹的《丹霞地貌与人文景观》一文较早地开始将丹霞这一独特的地貌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思考。^①1997年,翟辅东直接在《构建丹霞文化刍议》一文中指出:“今天提出丹霞文化意义上并不亚于20年代提出丹霞地貌的重要性,只是二者概念不同,不同历史时期作用不同而已。”^②此后张忠孝在《“丹霞”文化浅析》一文中提出“丹霞文化”的重要概念,他认为,“丹霞地貌分布区自然地理环境所孕育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是千百年来人类智慧凝聚、沉积的结果,从这里折射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它使丹霞地貌增光添色,注入了生命力和活力。”^③丹霞文化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旅游热的兴起,丹霞文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彭华、赵飞《浅论丹霞地貌类旅游区的文化开发》^④,许然、彭华《丹霞山旅游文化精品化战略研究》^⑤,郭福生、刘林清等人《江西省丹霞地貌发育规律及旅游区划研究》^⑥,曾爱花、曹养同等人《江西省丹霞地貌分布特征及旅游开发初步评价》^⑦等文章均将丹霞文化作为论述重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章均将丹霞文化作为丹霞地貌的旅游资源进行分析,且重点是开发丹霞文化的旅游价值。

2010年8月1日,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由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所组成的“中国丹霞”正式列为世界遗产。这一喜讯极大地推动了丹霞文化研究。虽然在2010年之前,已有葛云健、张忍顺《悬棺葬及其与丹霞地貌的关系》^⑧,卢云亭、卢宏升《我国丹霞地貌区丹霞古文化研究》^⑨,肖明光、陈欣、陈宁璋《泰宁丹霞岩穴文化群落之谜——试述丹霞岩穴文化与泰宁历史人文的关系》^⑩等文章对非旅游性质的丹霞文化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中国丹霞”申遗成功后,伴随着文化热的潮流,学界对于丹霞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涌现出罗成德、王付军《丹霞地貌与宗教文化关系初步研究》^⑪;周林图、李志文和郭福生《龙虎山丹霞地貌与民间文化心理及道教情结》^⑫;李志文、郭福生等人《龙虎山丹霞地貌特

① 参见黄进、黄瑞虹:《丹霞地貌与人文景观》,《热带地貌》1992年第12卷增刊。

② 翟辅东:《构建丹霞文化刍议》,陈安泽、卢云亭、陈兆棉主编:《旅游地学的理论与实践——旅游地学论文集(第5集)》,地质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③ 张忠孝:《“丹霞”文化浅析》,《经济地理》1998年第18卷增刊。

④ 彭华、赵飞:《浅论丹霞地貌类旅游区的文化开发》,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编:《地貌·环境·发展——2004丹霞山会议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9—274页。

⑤ 许然、彭华:《丹霞山旅游文化精品化战略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⑥ 郭福生、刘林清、杨志、曾晓华:《江西省丹霞地貌发育规律及旅游区划研究》,《资源调查与环境》2007年第3期。

⑦ 曾爱花、郭福生、曹养同:《江西省丹霞地貌分布特征及旅游开发初步评价》,《江苏地质》2008年第1期。

⑧ 葛云健、张忍顺:《悬棺葬及其与丹霞地貌的关系》,《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⑨ 卢云亭、卢宏升:《我国丹霞地貌区丹霞古文化研究》,陈安泽、卢云亭、陈兆棉主编:《全国第19届旅游地学年会暨韶关市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年,第76—97页。

⑩ 肖明光、陈欣、陈宁璋:《泰宁丹霞岩穴文化群落之谜——试述丹霞岩穴文化与泰宁历史人文的关系》,收入姜建军、赵逊、陈安泽主编:《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第14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第63—74页。

⑪ 罗成德、王付军:《丹霞地貌与宗教文化关系初步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

⑫ 周林图、李志文、郭福生:《龙虎山丹霞地貌与民间文化心理及道教情结》,《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征对道教文化传承之影响》^①；江榕《丹霞地貌承载的人文情结》^②；孙丽、李志文《龙虎山丹霞地貌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浅析》^③；罗成德、王付军《丹霞地貌崖文化初探》^④；彭颖睿《明末清初丹霞山的开发与文化景观的形成》^⑤等文。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发掘丹霞文化的旅游价值外，又进一步从宗教、思想等方面对丹霞文化进行理解与阐述。

纵观学界关于丹霞文化的研究，虽然研究领域、研究角度、研究深度均在加深，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首先是目前学界研究多集中于南方地区，而对于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丹霞文化研究较少。而受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影响，不同地域之间的丹霞文化，亦各有特点。不能仅将目光对准丹霞地貌更为显著的南方地区，忽略广大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其次是目前学界对于丹霞文化的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宗教及思想方面，并逐渐形成了北方大部分丹霞文化以石窟艺术与宗教文化积淀为主，南方丹霞更多的是以山寨文化与墓穴文化为主的印象。^⑥但事实上，丹霞文化所涉及范围不仅只有宗教、思想等，还有很大的拓展潜力。再次是目前在丹霞文化研究中，缺乏将地质地貌、人类活动以及文化三者紧密结合并系统阐述三者之间关系与互动的著述。

丹霞文化研究经过20余年的发展，取得不少成就，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而针对上文所说的丹霞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陕北地区丹霞地貌人文地理研究将会是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二 相关历史文献对陕北红层地貌的记载

位于府谷县皇甫川镇墙头农业园区（原墙头乡）的莲花辿，是2017年陕西省地质调查院“陕北丹霞地貌地质遗迹调查”项目的重要调查区之一。莲花辿位于鄂尔多斯地层分区，主要地层岩性有“三叠系刘家沟组（T11j）：红色长石砂岩、粉砂质泥岩（以河流相为主）；和尚沟组（T1h）以一套湖泊相为主的棕红、桔红、紫红色泥岩及二马营组（T2e）的灰绿色砂岩夹红色泥岩。三叠系地层下部零星出露二叠系石盒子组（P1-2sh）的砂岩、泥岩及页岩和孙家沟组（P2T1s）的泥岩和粉砂岩等。莲花辿为黄河入陕第一个弯右侧侵蚀岸，主要为紫红色和灰绿色砂岩泥岩互层，砂岩为中细砂。厚层约9米，薄层2厘米，顶部有少量黄土覆盖，上部则为厚层砂岩，约37米，层理的阶梯面有少量植被发育”^⑦，兼具地质价值、观赏价值以及文化价值。

虽然丹霞地貌的概念是近代提出的，但早在中国古代，陕北地区的民众就已经发现了丹霞等红层地貌与众不同的特点，并将其记录下来。在方志繁荣的明清时期，陕北地区有关丹霞等红层地貌的记载十分丰富。如莲花辿（旧志中写作“莲花缠”）一带“峦阜错列，石色红白相杂”^⑧；花石茆地区“石壁色红，间有白文”；五虎山桃花洞一带“崖中有朱砂，洞艳如桃花”^⑨；镗子山

① 李志文、郭福生、孙丽、张文秀：《龙虎山丹霞地貌特征对道教文化传承之影响》，《热带地理》2012年第6期。

② 江榕：《丹霞地貌承载的人文情结》，《环境》2012年第6期。

③ 孙丽、李志文：《龙虎山丹霞地貌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浅析》，《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④ 罗成德、王付军：《丹霞地貌崖文化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

⑤ 彭颖睿：《明末清初丹霞山的开发与文化景观的形成》，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⑥ 参见周学军：《中国丹霞地貌的南北差异及其旅游价值》，《山地学报》2003年第2期。

⑦ 以上数据由陕西省地质调查院以及长安大学地质遗迹保护研究所查方勇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⑧ 李熙龄纂修：《榆林府志》卷4《山川》，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⑨ 刘于义修，史貽直、沈青崖纂：雍正《陕西通志》卷13《山川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山色俱赤”^①；红山地区更是“环列若屏障，落日照之，如霞起焉”^②；片石茆“俱红白色相杂，而巔尤绚丽高布。山半有长坡一道，自西至东计五里；东下坡，色亦如之，高低簇铺，人行其上如在云霞中，顿忘足力之倦”^③。足见当时人们对于丹霞等红层地貌之美的感知丝毫不亚于今日。其中关于莲花辿之记述最为生动，乾隆《府谷县志·荣河十景纪略》中“莲花耸胜”一节载：

县东莲花缠山。高百余仞，南面黄河，西北绵亘二十里，东缠属河曲边外，峰峦较少，西缠属县边外。相峙十余里，中以灰沟为界，皇甫川边墙起筑西缠上也。巨石巉岬，阨骈危耸，于县为东障，于陕省为北边首钥，雄已！而山石一路皆红白相间，鲜色克餐。峰峦之远近高下相错杂，奇丽万状。右挹东缠，左盼西缠，奇峰波属，迷离插目。坡下壑五里许，有圆尖小沙石墩，弗啻亿计，红者白者，高下团声，纷披连接，宛若一大池勃绽之莲苞焉。雨后，墩容华滋，苔藓铺绿，弥觉荷叶增胜，抑又秀甚。山以莲花缠名，有以也。^④

由此可见莲花辿地区极高的美学观赏价值，但陕北地区长期为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势力交界之地，是历代军事战争与民族往来的重地，处在这一地区之中的丹霞地貌也更多地与军事战争发生联系，因而陕北地区丹霞文化更多体现在军事文化方面。

三 莲花辿丹霞地貌与军事防卫

史念海曾指出：“从陕西全省观察，陕北的黄河两岸似乎是偏处一隅，无足轻重，而实际却不仅屏蔽着关中，也屏蔽着太行山东西和大河南北。宋明两代之所以重视这里的防备，正是由于这里关系着当时都城的安危，不能稍事疏忽。”^⑤ 陕北丹霞地貌区多位于蒙陕交界地带，长期以来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对抗的前沿，莲花辿等拥有险峻地势自然成为历代重要的军事设防区。

府谷地区“黄河带其南，长城绕其北，地据上游，势若建筑，实秦晋之咽喉，关陕之险要也”^⑥。自唐代设镇以来，为历朝防御北部与西部游牧民族势力的重要据点，而在府谷东北端，莲花辿（时称莲花缠）丹霞“崇峰叠嶂，雄树垣藩”^⑦，更是府谷边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期，府谷“其地险绝，实捍西戎”^⑧，出身少数民族的折氏家族曾掌控这一地区百余年之久，成为宋王朝抵御西夏势力的重要力量。但莲花辿丹霞地貌区在军事上发挥突出作用的时期还是在明代，这一时期由于明、蒙的长期对峙，使得“天下之大防莫严于华夷之辨”^⑨ 思想再度兴起，莲花辿丹霞地貌区也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

①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陕西省府谷县史志办公室整理：《府谷县志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

② 王廷弼修，谭吉聪纂，刘汉腾、纪玉莲校：康熙《延绥镇志》卷1《山川》，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③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12页。

④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荣河十景纪略》，第253—254页。

⑤ 史念海：《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河山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集，第144页。

⑥ 刘于义修，史貽直、沈青崖纂：雍正《陕西通志》卷7《疆域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1《疆域》，第189页。

⑧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195《方域二十一》，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手稿本重影印。

⑨ 涂宗濬：《续修延绥镇志序》，郑汝璧等纂修，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万历《延绥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

（一）丹霞地貌与军事设施的修建

地形对于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草庐经略》载：“凡大山大水、坳坎、关隘、险阻、林木、沮泽之处，俱险也。”^① 占据优势地形进行布防，对于在对蒙战争中长期处于守势的明王朝至关重要，利用险峻地形布设寨堡等军事工事在明代陕北地区极为普遍，如木瓜园堡“设在高阜，东、西、北俱大沟深险，南、西峻坡”^②，十分险要；龙州堡“负山斗绝，虏不敢仰窥”^③；孤山堡则有“簇簇青山隐戍楼，暂时登眺使人愁”^④之势。除此之外，怀远堡、清坪堡等设在顶平的高山、高阜之上，也具有极大的军事防卫价值。莲花辿地区的军事工事亦利用所在区域地形地貌特点进行构建，丹霞地貌所具有的顶平、身陡、麓缓三大特点不仅为明代在此地区的军事防守提供了地理优势，也为这些军事设施的建设提供了便利。

丹霞地貌首先具有顶平的特点，这为大型军事工事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因而莲花辿一带在明代有众多军事设施布设，如成化年间所修二边长城，“东自莲花缠之保河台起”^⑤，武宗正德二年（1507）所更置之砖墩亦“自定边营达黄甫川，延亘千里”^⑥。此外，明代寨堡体系亦是“东其清水营之紫城寨，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蔓几二千里，每二三里为对角敌台崖寨，连比不绝”^⑦。从上述史实可以发现，无论军事防御体系怎样修缮与改变，黄甫川堡、紫城寨等莲花辿地区所建的工事，始终是重要的东端点。这一方面是由莲花辿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另一方面，莲花辿丹霞顶平的特点便于军事工事建设也是重要原因。除长城外，这一地区还有黄甫川堡、清水营堡寨堡以及大量墩台分布，如作为二边长城起点的逐虏台（也写作竺碌台、筑禄台等）^⑧“高三丈，周十五丈”^⑨，其所处之地“巨石瓌岢”^⑩，极为高险，隔黄河可与山西河曲的守河十墩相望，对于防守黄河西岸，有着重要作用，但台所在之山顶部却较为平缓，宜于墩台的建设。包括莲花辿在内的广大陕北地区既有险峻地势可以用来防御，又有平缓之处用来修建工事的特点被人们广泛利用，明朝余子俊“相度边地，画形势，于沿边一带高山陡崖，依山随形，地势或铲削，或累筑，或挑堑，绵延相接，以为边墙”^⑪。

丹霞地貌顶平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蒙汉之间的互市以及各堡寨之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延绥镇志》卷2《市镇》记述了清代陕北互市的繁荣景象：

-
- ① 佚名：《草庐经略》卷9《度险》，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8页。
- ② 郑汝璧等纂修，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 ③ 郑汝璧等纂修，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第84页。
- ④ 杨一清：《孤山堡》，陕西省府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府谷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991年，第16页。
- ⑤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1《疆域》，第190页。
- ⑥ 《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25，正德二年（1507）四月己卯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688页。
- ⑦ 黄瑜著，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卷8《河套墩台》，中华书局，1999年，第149页。
- ⑧ 《明史》卷13《宪宗纪》载“边墙自紫城寨至花马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69页。舒时光、邓辉认为竺碌台即明代紫城寨，参见舒时光、邓辉：《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修筑及其地理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 ⑨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荣河十景纪略》，第254页。
- ⑩ 刘于义修，史貽直、沈青崖纂：雍正《陕西通志》卷13《山川六》。
- ⑪ 佚名：《草庐经略》卷9《守险》，第144页。

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帐焉；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①

其中皇甫川市、清水营市便位于莲花辿及其附近地区，丹霞顶部平缓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为大规模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城镇及营堡俱有市，而沼边村落亦间有之”^②，诸如莲花辿一带皇甫川之呆黄坪、清水营之尖堡子等，隆庆五年（1571），清水营堡甚至“设马市于此”^③。这些商贸活动，特别是马市，均需有一定平缓地形处作为其贸易场所，丹霞顶部较为平缓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堡寨的商贸活动需要。

丹霞地貌的又一重要特点是身陡。“易限戎马之足”^④，这对于军事防卫十分重要，正所谓“守城不如守险”^⑤。莲花辿丹霞崖壁陡峭，“仄径巉险，未易攀跻”^⑥。清代学者黄宅中称莲花辿与河曲“一河之隔，秦晋分圻，峭壁层崖，束洪波而南，洑怒涛触石，声如巨雷，操舟历险，处处皆然”^⑦。顾炎武认为莲花辿所在的东路防御区“利在险也”^⑧。乾隆《府谷县志》亦载：“（府谷）东南逼临大河，最称险要，自昔首难深入。”^⑨由此可见莲花辿丹霞崖壁之陡峭险峻，很难直接攀登而过，再加之府谷段黄河“两岸逼侧无十步”^⑩，这样的地势不仅对来犯的敌军造成较大的阻碍，也不利于敌军攻击设立在丹霞顶部的军事要塞，进一步增强莲花辿等府谷沿河地区的防卫能力。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虏数千骑突入延绥皇甫川关城，焚劫城内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⑪。

虽然历史材料中没有确切提及仰攻莲花辿地区军事工事的战役，但府谷县城亦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且“东西皆陡崖”^⑫，其形势与莲花辿地区的寨堡有共同之处，致使清军“数渡河仰而攻之，弗克”^⑬。由此可以推知莲花辿等丹霞地貌“身陡”的特点对于军事防御的重要作用。

（二）丹霞地貌与军事交通

麓缓是丹霞地貌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有助于交通点和交通线的建设。在陆路交通方面，莲花辿一带的皇甫川堡、清水营堡地区与周边的木瓜园堡以及靖边、榆林丹霞区的怀远、清平等诸多寨堡之间均有道路沟通，既可以在战时使各堡互相支援，也可以在平时便利民众相互往

① 王廷弼修，谭吉聪纂，刘汉腾、纪玉莲校：康熙《延绥镇志》卷2《市镇》，第113页。

② 王廷弼修，谭吉聪纂，刘汉腾、纪玉莲校：康熙《延绥镇志》卷2《市镇》，第113页。

③ 陈履中纂：乾隆《河套志》卷3《陕西宁夏镇所属沿河套南边城堡》，清乾隆寓园刻本。

④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09页。

⑤ 佚名：《草庐经略》卷9《守险》，第140页。

⑥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1《疆域》，《府谷县志两种》，第190页。

⑦ 黄宅中：《今黄河源委说》，收入金福修，张兆魁等纂：同治《河曲县志》卷7《艺文志》，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⑧ 顾炎武著，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全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15卷，第2039页。

⑨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4《兵防》，第406页。

⑩ 萧贡：《黄河天桥》，府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府谷文史资料》第8辑（内部资料），1993年，第16页。

⑪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546，嘉靖四十四年五月辛酉条，台湾“中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第8823页。

⑫ 汪楫：《崇祯长编》卷36，民国北平图书馆红格钞微卷影印。

⑬ 李天根著，仓修良、魏德良校：《燭火录》卷19，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来。但各堡之间陆路交通状况极不稳定，随局势而变化，嘉靖年间甚至出现过“诸堡道路皆绝，人烟稀少，商贩不至”^①的窘境。至清代，这一地区的陆路交通线路才逐渐完善，宁夏谷米“自归化城，由保德州、府谷县一路，可至潼关，则为益甚速”^②。

丹霞地貌区与水路交通也有着较大联系。按照《府谷县志》《榆林府志》的说法，莲花辿地区的大缠渡口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君子津，邓森云《府州城》一诗中亦有“若问名津处，悬知君子来”^③之句。这一沟通秦晋两岸的重要渡口，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水经注》载：

昔汉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贾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其资货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津。”^④

此后，君子津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北魏太武帝进攻赫连夏政权的统万城，北魏明元帝西狩薛林山均经君子津。

由于河曲与大缠渡口之间“河宽三里”且水势较急，可谓天堑，但至冬季则“冬寒水合，万马可渡”^⑤，因此军队大多趁冬季黄河结冰之时通行。如晋太和三年（368）代王拓跋什翼犍攻打刘卫辰势力，途经君子津，“散芦于其上，冰草结合，有如浮梁”^⑥，使代军顺利渡河。北魏始光三年（426）十月，太武帝西征赫连夏政权，至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结”^⑦，魏军趁机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地区。明代蒙古诸部亦常借冬季河水冻结之机南下，如成化五年（1469）冬，蒙古势力“乘冰渡河，深入寇钞”^⑧。正德九年（1514），“冰合，敌骑尽入河套，延、宁、固原皆当警备”^⑨。嘉靖五年（1526）“虏亦卜刺驻牧宁夏贺兰山后，将以冰合渡河入套，陕西诸边皆患之”^⑩。这些蒙古冬入事件使府谷一带沿河地区形成了“四时防胡，三冬防河”^⑪的局面。“黄河南岸，各深冻，可以履冰逾越”^⑫，对陕西沿边一带造成威胁，使莲花辿大缠渡口等重要津渡成为防御重点。

山陕之间大缠渡口等重要津渡的存在，使两地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府谷一带若被攻陷或侵袭，必定殃及河对岸的河曲，如明末王嘉胤起义，攻破府谷不久便“渡河犯晋”^⑬。所以当府

① 刘于义修，史貽直、沈青崖纂：雍正《陕西通志》卷38《屯运二》。

② 《清史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1692）壬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册，第707页。

③ 邓森云：《府州城》，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雍正《府谷县志》卷8《艺文》，陕西省府谷县史志办公室整理：《府谷县志两种》，第126页。

④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河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80页。

⑤ 陈履中纂：乾隆《河套志》卷3《延绥镇所属沿河套南边城堡》，清乾隆寓园刻本。

⑥ 《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二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3208页。

⑦ 《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1页。

⑧ 《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75，成化六年（1470）正月壬午条，台湾“中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第1437页。

⑨ 《明史》卷199《李承勋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266页。

⑩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60，嘉靖五年正月丁酉条，台湾“中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第1411页。

⑪ 郑汝璧等纂修，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第62页。

⑫ 《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196，弘治十六年（1503）二月己亥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第3610页。

⑬ 《崇祯实录》卷4，民国北平图书馆红格钞微卷影印。

谷遇有紧急情况时,河曲方面如有实力便会“渡河援应,并著添劲旅,严防河保一带”^①;如无力抵抗,也会“将官私船尽行拆毁”^②来阻止敌军渡河。此外,战乱时期,双方民众也会流亡彼地,如“王国忠,府谷人,以避乱走河曲”^③。而在和平时期,山西与陕西民众亦通过大缠渡口互通有无,如“河曲之民食,有资府谷之烧煤不缺”^④。府谷民亦渡河赴河曲采办石材,如《起立卧碑记》载:“遂鸠工采石河曲,不数月而五碑俱立。”^⑤

无论是各寨堡之间的道路还是大缠渡口(即君子津),能够长期成为军事要道,都与莲花辿、榆林、靖边地区丹霞地貌麓缓的特点有重要关系,正是在这种较为平缓的麓间才有助于交通线路的布设与稳固渡口的建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乱时期,丹霞地貌不仅为政府军队阻击敌人提供了地理优势,也为普通民众躲避战乱,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庇护。陕北地区丹霞地貌的洞穴多为风蚀洞穴,“北方较大的日夜温差使岩石块松动,风吹蚀岩面形成许多很小的凹坑,强风挟带沙粒沿凹坑钻磨,在崖壁上形成了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洞穴”^⑥,而丹霞地貌的洞穴“因洞体大且干燥”^⑦,可供民众居住。在南方地区,丹霞洞穴多被用来建造寺观或佛像,供僧道居住。而在军事战争频繁的陕北地区,这些洞穴亦可被民众用来躲避战乱。如府谷山崖窑,“有古窰子,居民避乱处”^⑧;黄甫南陶家山的石窑洞“王嘉胤作乱,乡人多避兵与此,全活甚众”^⑨。此外,在此次陕北丹霞调查区范围内,木瓜园堡南部“可寓数百人”^⑩的石佛塔崖窑,是明代张克敬等人因蒙古势力南下侵掠人畜,而进行利用与改造的,“以为近堡居民避寇”^⑪;磁窑山洞“弘治间僧人创之,以济人避兵者”^⑫;府谷广福洞亦是“明末堡人避兵处”^⑬。可见这些洞穴在战乱时期不仅对于政府有重要利用价值,对民众亦十分重要。

总之,无论是寨堡的修建、险峻地势的利用、交通线路与渡口的建设,还是民众避乱地的选择均与陕北丹霞地貌有一定联系。“一般地来说,决定军事行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是地理条件。然而,一切军事行为或战争都必须在一定地理条件下才能进行,因此,就不能不受着地理条件的影响和制约。”^⑭莲花辿等丹霞地貌区正处于内蒙军事斗争的前沿,且这一地区丹霞并不利于农业生产,使其军事作用远远超过生产与生活作用。自唐宋以来,中央政府就利用这里丹霞的

①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34,同治七年(1868)五月壬辰条,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25页。

② 汪楫:《崇祯长编》卷35,民国北平图书馆红格钞微卷景印。

③ 李熙龄纂修:道光《榆林府志》卷32《人物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④ 黄宅中:《团练议》,收入金福修,张兆魁等纂:同治《河曲县志》卷8《艺文志》,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⑤ 范学颜:《起立卧碑记》,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雍正《府谷县志》卷8《艺文》,陕西省府谷县史志办公室整理:《府谷县志两种》,第97页。

⑥ 周学军:《中国丹霞地貌的南北差异及其旅游价值》,《山地学报》2003年第2期。

⑦ 黄进、黄瑞红、苏泽霖:《丹霞洞穴地貌的初步研究》,陈安泽、卢云亭、陈兆棉主编:《旅游地学的理论与实践——旅游地学论文集》第一、二集合订本,2006年,第60页。

⑧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18页。

⑨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28页。

⑩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25页。

⑪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25页。

⑫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27页。

⑬ 郑居中修,康文慧总点校、马少甫点校:乾隆《府谷县志》卷2《山川》,第228页。

⑭ 上官鸿南:《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

独特条件构建军事防御工事，至明代到达顶峰，形成了以自然的险峻地势与人工的边墙、寨堡于一体的防御体系，为巩固明王朝统治发挥了较大作用。

“从整体上说，军事行为就构成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军事行为的主体即人的方面，一个是军事行为的地理条件即可观环境方面，从而形成了一对矛盾。”^① 所以仅有地理上的优势还不能决定军事斗争的胜负，完善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也影响着战局的变化。以各堡相互支援为例，明代陕北各堡寨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有着一套较为成熟的相互支援与联动制度，以便战时可以协同作战，黄河“在大同西界偏头、河曲、延绥，东界府谷、神木之间。故西路有警，则宣、大游兵驻河东滨；东路有警，则延、宁游兵驻河西滨。戎入套，则西路之警；出套，则东路之警”^②。

虽然明王朝在陕北丹霞等险峻地貌上修建了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但朝廷内部各势力的争斗与吏治腐败等因素，使看似坚固的防御体系并未完全发挥作用。明代学者陶其榛所作“府谷荒城大如斗，守土之臣夜半走。土贼攫人人奔呼，搜金逼命刀声吼”^③，形象地反映了官军败退后，府谷民众的悲惨遭遇。府谷城有“山为城郭但增障，城下黄河胜凿池”^④之天然优势，但仍被攻破，可见地理优势只是军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自然因素，而决定战争胜负或防御是否成功还在于指挥者的策略、军队的纪律以及士气等人为因素。

结 论

“不论在中国南方还是北方，丹霞地貌均与人类历史活动关系密切，只是由于中国南北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南北方丹霞地貌的文化沉淀差异也较为明显。”^⑤ 陕北地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交界地带，长期以来是民族交往的窗口。统一和平时期，这里是不同民族互通有无的交流平台；割据分裂时期，又往往是军事对峙的前沿。在这种背景下，陕北地区丹霞地貌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不同于南方地区，以府谷莲花辿丹霞为例，陕北地区丹霞文化更突出的体现在军事文化方面，丹霞地貌顶平的特点利于长城、墩台、堡寨等军事设施的建设；身陡的特点有利于己方的防御，对敌军的行进与进攻造成了巨大的阻碍；麓缓的特点又有利于交通线路与驿站津渡的建设。此外，再加上莲花辿地区临近黄河，形成天堑作用，使其军事防御能力进一步提升。要之，莲花辿等陕北丹霞地貌的地理条件为宋、明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布防与作战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但军事斗争的结果并不是仅由双方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兵力、策略、士气等都是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重要因素。

军事斗争并不是这一地区民族交往的常态，在和平时期，丹霞地貌上的军事设施在维持稳定、保证通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所以陕北地区丹霞文化虽然较为突出的体现在军事文化上，但其也交织着民族交往、商贸往来等方面，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值得学界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上官鸿南：《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

② 郑晓著，李致忠点校：《今言》，中华书局，1984年，第92页。

③ 李熙龄纂修：道光《榆林府志》卷50《艺文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④ 杨琚：《府谷》，李延寿修，杨怀纂，樊高林、曹树蓬校：弘治《延安府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3页。

⑤ 周学军：《中国丹霞地貌的南北差异及其旅游价值》，《山地学报》2003年第2期。